

中国近代社会科学家

罗常培传略

白吉庵



罗常培字莘田，号恬庵，笔名贾尹耕，斋名未济斋，生于1899年8月6日，北京宛平人，满族，满姓为萨克达氏，名仁禄。其父恩禄在清末宣统时为宣武门城门吏。民国后，改编为陆军小队官。

罗常培七岁入塾，读书用功，甚得老师之喜。九岁入京师公立第二高等小学堂，因成绩优秀，被编入高小二年级，时与舒庆春（老舍）为同班同学。老舍在短篇小说《歪毛儿》中说：罗常培少年时头上留的辫子与其他同学不一样，别人是往后梳，他却往两边梳，走起路来好像拨浪鼓似的，因此人们管他叫“歪毛儿”。他脾气大，倔强。有时背不上书来，不挨打，因为老师喜欢他，但他却不饶自己，主动要求受罚。这样，老师也只好拿起板子来打他的手心了。罗常培领受手板后，眼泪在眼眶里直转，但他抑制住，不让它掉下来，只是用手搓着膝盖，低着头念书，直到会背，他的脾气才逐渐平息下来。可见罗常培打小时候起就严于律己，的确有股子拗劲儿，

辛亥革命后，学校暂时停办，他便利用这个机会在家补习国文、英文、算术，并兼学蒙语。1913年考入公立第三中学，因英文好又跳了一级。老舍说他是品学兼优，常常跃级，指的就是这个时候。1915年秋，北京学务局举办了一个中学四年级学生会考，他考第三名。这时他的家庭生活有了困难，他父亲希望他去工作，也好挣点钱来补贴家用，因此授意他去学速记，求一技之长，以便到社会上好谋事。他体谅到家庭的难处，便利用晚上的时间去学速记，白天仍在中学读书。这样无疑加重了学习负担，但他上进心强，能吃苦，坚持下去。后来学了六个月，毕业考试名列第二，一分钟能记140个字，速记老师蔡璋很器重他。当时要找个工作，根据他的条件，是不成问题的，但他不愿走向社会，求学心切，因此仍在学校继续读书。

十七岁那年，他父亲病逝，被生活所迫，不得不去找工作，于是他求助于蔡璋。蔡时在国会众议院秘书厅当速记科长，介绍他去任速记二等技士。从此每月挣八十元大洋、开始独立生活，并有余力供给家用了。但他不以此为满足，为了实现他的理想，这年秋天他考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，半工半读：一星期用三个半天到众议院工作，余下的时间到北大学习。

入学后他对钱玄同教的“文字学（音篇）”很感兴趣，这跟他小时候学过蒙语、英语有很大关系。第二年听刘师培讲“中古文学”，兴趣更浓。每次上课均用速记作笔记，回家后再翻译成文言收藏起来。后来他根据这些笔记整理出版了《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》一书。再者，刘通“小学”并擅长骈文。罗尽得其传，也写得一手好骈文。那时社会思潮激荡，他们班里的同学，由于思想认识不同，形成了三派：一是“新潮派”、二是“国民派”、三是“国故派”。罗喜爱旧文学，受刘师培影响较深，因此属于“国故派”，倾向保守，但在“国故杂志”

上没有发表过文章。到大学三年级时爆发了“五四”运动，新旧文学论战十分激烈。他读了蔡元培给林纾的信，和“新青年”杂志上的许多重要文章后，思想起了变化。接着他又对比了新旧人物在社会上的种种表现，认为旧的那套太不符合时代潮流了，于是态度转向革新，完全拥护蔡元培提出的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的主张，并以此作为自己努力的方向。后来蔡元培去世时，罗很悲痛，曾写了《博大和坚贞》一文来哀悼他。

1919年夏，罗在北大中文系毕业，按老规矩，学而优则仕，满可以到社会上求个一官半职，但他不愿这样做。因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，他想出国留学寻求新的知识，但又无有力量，于是只好决定再入北大哲学系深造。当时该系教师有胡适、梁漱溟、蒋梦麟等，并有外籍学者杜威、罗素先后来讲学。罗在这里开始接受西方资产阶级的实验主义，并对中西文化思想的交流与发展有了比较系统的了解。因为有中文底子和速记才能，1921年暑假，他应梁漱溟之约请，随他到济南讲学。后来梁出版的《中西文化及其哲学》，就是这次讲学由他执笔的速记稿，并经他与陈政合编而成。不久，当他回到北京时，段祺瑞的安福国会已解散，于是开始失业与失学。后得天津友人之助，介绍他到南开中学去教国文。

次年，黎元洪在直系军阀的拥戴下又重新上台，恢复了旧国会，这时罗又回京复职，继续做速记工作，并在京师公立第一中学兼任国文课。后来这个学校的校长出国，他被委任为代理校长。他上任后，很想干一番事业，因此他将学校给他的全部薪水捐献出来，购买图书，改革规章制度，公开财务，延聘优秀教师，支持进步的学生等等。这样干了一年，深受学生的欢迎和拥护，然而却遭到一些与原来校长有关系的人的嫉妒。第二年那位校长刚一回国，学务局就把他代校长的职务给勾销了。当时罗常培十分气愤，三天之内交代了工作，便辞职回家。恰好这时西安成立西北大学，经友人介绍他到该校任国文

专修科主任，在那里第一次讲授“文字音韵学”这门课。他过去虽然有这方面的知识，而且懂各地方言，但学无止境，这次在教学中发现了许多问题，自己一个人没有资料，感到苦闷。当时的西安，处于军阀混战年代，交通梗阻，慢说是报刊进不去，就是平安家书也很难送到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他只好离开了。1924年夏返回北京，在执政府仍操旧业，同时兼任私立四存中学的国文教员。

这样过了一年多，1926年春，北洋军阀肆无忌惮地镇压学生的爱国运动，爆发了“三一八”惨案。罗常培看到许多爱国青年惨遭杀戮，心里异常忧愤，感到在这样黑暗政府底下工作太没有意义了。适有厦门大学在京聘请教授，他经林语堂的介绍，随鲁迅、沈兼士等，于是年秋到厦门大学中文系教“中国音韵学沿革”。在这里他开始大量阅读外国语言学方面的书籍，并用现代语言学理论来分析中国的语言问题。他虽然很注重中国传统的语言学，及清代的樸学，但不保守，能取人之长补己之短，从实际出发重编讲义。因此上课时，他能把古奥难懂的音韵学原理，深入浅出地讲得条理分明，头头是道，学生们每上一次课，都有很大收获。课后他又带学生走出学校，到社会上去搞调查。他认为做学问占有第一手资料很重要，常对学生说：有一分材料，说一分话；写文章时要小题大作，深入浅出。这是他经验之谈，要人们重视实践，深入研究，把心得通俗地介绍出来。后来他写的《厦门音系》，就是这时调查研究的结果。在这部书里，他运用现代语音学的理论，着重解剖一个麻雀——厦门地区的方言，从声、韵、调的音值去分析，并与古音（广韵）及传世之方言（十五音）进行比较，得出其中条贯。因此，这书出版后，对我国汉语方言的研究，起了促进作用。

罗常培在厦门大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，都是很有成绩的，但由于人事上的原因，又不得不决定离开这个地方。他们同去

的这些人，原来打算找一块安静的地方做学问，暂避反动政府的迫害，那知到厦门后却发现学校内部派系斗争非常激烈，使他们很难继续呆下去，因此不到一年，大家又不约而同地离开了。

罗常培离开厦大后，在浙江民政厅工作过一个短暂的时间。这年夏天他在杭州见到黄侃手校的一部《广韵》，里面标注着许多费解的符号，而又没有说明，于是他便利用业余时间，废寝忘食地进行研究，经过反复排比和探讨，最后终于找出其中的条贯。后来人们佩服他的这种钻研精神，因此称他为“黄门侍郎”。不久，傅斯年由海外回国，旋即在中山大学任文学院院长，约他去教书，所以1927年秋应聘到广州，任中大文学系教授。这时正好碰上赵元任由北京南下调查两广方言，他利用这个机会，把多年积攒下来的问题，和赵讨论了一个多星期，收获出乎意料之外，他后来回忆说：“的确比自己摸索着读三年受益多得多。”^①可见学问之事，切磋、琢磨是多么的重要。1928年傅斯年在广州筹备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，约罗兼任秘书。次年该所迁往南京，他便辞去中大的教授，做研究所的专职研究员，一直到1935年离开时为止。在这七年里，他孜孜不倦地工作，写下了《国音字母演进史》、《唐五代西北方言》等专著，及《中原音韵声类考》、《知彻澄娘音值考》、《中国方言研究小史》等论文。此外又调查了徽州地方的方言，编写了《汉魏六朝韵谱》和《经典释文反切》的长编。由于罗常培辛勤耕耘，因此硕果累累，丰富了语言学这块园地，为我国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。

1934年北大刘复病逝，文学院院长胡适向当时在南京的史语所借聘罗常培到北大任教，并请他主持文科研究所语言乐律实验室的工作。次年他只身北上，家眷留在杭州。到北大后，他一心一意搞教学，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即“舍己耘人”，意思是为师者，当有舍己田，而耘人之田的精神。因此他对学生要求严

格，重视基本功的培养和训练，强调理论联系实际。他认为：要学习好中国文字音韵学，不仅要通古今之音变，而且还要了解外国的东西，在广博的基础上深入，才能做到触类旁通，收举隅反三之效。的确他本人就是知识渊博，治学谨严，刻苦力学的一位学者。因而在教学中他能把别人视为枯燥无味的音韵学、或称之为“绝学”的古音学，讲得生动活泼，有条有理，使学生易于接受，他的教学效果是非常出色的。有鉴于此，1936年北大请他当中文系主任，想以此留住罗常培。次年中央研究院怕他在北大久假不归，便想方设法催罗回来，而北大却拉住他不放，为了争取他留下，北大准备给他研究教授的待遇，每月薪水由四百元提高到六百元。当时罗很苦恼，他说：“为了自己，我应该回去；为了学生我应该留下。”后来决定留下。关于待遇的处理：他认为顾颉刚当时主办的《史学消息》办得好，准备拿二百元办一个《汉学消息》贴补穷学生，每人50元；自己仍只取四百元。这充分表现了罗的高风亮节。

“七七事变”后，北平很快陷入敌手，北大将往何处去？谁也琢磨不定，大家都很悲愤。这时北大校长蒋梦麟，文学院院长胡适等人已先后南下、学校只剩下以校务秘书长郑天挺为首的三十六位教授在维持着残局。罗当时除分担郑天挺一部分工作外，每天就借著作来排遣愁烦。这时他完成了《临川音系》，并与周祖谟等编订了《汉魏六朝韵谱》，与吴晓铃等重抄了《经典释文反切》卡片。他在《七七事变后北大残局》一文里回忆这段时说：“与其成天楚囚对泣，一筹莫展，何如努力从事自己未完成的工作，藉以镇压激昂慷慨的悲怀？假如能够在危城中，奋勉写成几本书，以无负国家若干年养士的厚惠，那么就是敌人把刀放在我的脖子上，也是含笑而逝。”罗是一个务实的学者，在客观环境动荡不安的时候，仍是埋头工作，力所能及的社会义务，在当时情况下，也是难得的。后来日本人的势力逐渐侵入北大，学校一天天难以维持下去。这时南京

政府教育部在长沙成立由北大、清华、南开组成的临时大学，文学院在南岳。蒋梦麟等人屡电北大，催教授们南下，其中特指明“国文、经济两系需人，盼莘廉两兄即来”云云。在接到这讯息后，罗常培排除家庭困难，只身与郑天挺、罗庸、魏建功等于11月17日离开北平，取道天津乘船南下到湖南。而当他们到达南岳分校后，学校因南京失守，又决定迁往云南，改名为西南联合大学，本部设昆明，文法学院在蒙自。于是他们又辗转入滇，先到蒙自分校教书一学期，然后合并到昆明本校。后来朱自清辞中文系主任职，他被学校当局委之为主任，并兼任文科研究所的所长。

1938年春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北大文科研究所相继搬到昆明。当时的语言工作者觉得在云南不好展开工作，原因是昆明话与普通话区别不大，而少数民族的语言又比较复杂，研究起来困难重重，所以有松劲泄气的思想。但罗常培的看法却与此相反，他认为云南少数民族多，语言资料丰富，正是有利条件，应该鼓起勇气做一个拓荒者，去开发这块黄金地。于是他带头调查了昆明话的语言系统，同年写出《昆明话与国语的异同》在《东方杂志》上发表。后来两个单位接受了他的建议，组织人力于1939年开始工作，用了五年的时间，调查了九十八个县，一百二十三个点，收获颇大，一共写出报告和论文四十余篇。参加的人有李方桂、袁家骅、丁声树、傅懋勤、马学良等人。他们的研究成果，为后来研究汉藏系语言的工作奠定了基石，同时给中国语言学史增添了新的篇章。至于罗常培本人，在公务繁忙的情况下，也曾先后三次到滇西大理进行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调查，并为大理县志编写方言志，又写了《景颇语中的词头儿——》与《莲山摆彝语初探》、《贡山俅语初探》等论文和专著。这对我国语言学界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提供了宝贵的资料，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，是他在语言学方面的一大贡献。因为过去的一般语言专家是不太重视

少数民族语言的，有的人甚至轻视这工作，罗常培排除这种偏见，身体力行，而且，他还教导和鼓励学生去从事少数民族语言的调查和研究，这就更加难能可贵了。1943年春，他与昆明各大学的十位教授，应当时在滇西督师抗日的云贵监察使李根源，及“滇西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”教训长宋希濂的邀请，到大理去讲学。当地的文化界及教育界的教师们都去听讲。他讲演的内容也是有关本行业务，鼓励人们学习语言，对少数民族进行调查与研究。由此可见，他对普及语言学的工作也是十分重视的。

这年夏天他在“联大”，为了扩大学生的知识面，曾组织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学术演讲会，参加讲演的人有著名的民主战士李公朴、闻一多等人，这次学术活动，他以“语言与文化”为题，发表了演说。他认为语言不是孤立的一种社会现象，而是与社会生产有着密切的联系，并且影响到文化的发展，他主张把语言学与人类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。上述思想在当时的语言界，还是比较新颖的。这次演讲共办了两期，廿四讲，在丰富学生的知识，活跃民主政治气氛方面，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绩，但另一方面也引起了政府有关部门的注意。次年，国民党当局突然宣称要解聘一批进步教授，罗常培知道后，大义凛然地站出来，写信给重庆“新华日报”，揭露其阴谋，提出强烈抗议。这件事不仅支持了昆明的民主运动，同时也表现了他勇于追求真理，要求民主的爱国思想。

罗常培为人刚直不阿，疾恶如仇，对学生却是满腔热忱。他接人待物的特点，当面有意见说出来，背后从不说人家的坏话，与那种当面说好话，背后说坏话的人，形成鲜明对比。他对人诚恳、热情，如果有人恶意中伤了他的学生，那他非跟他争论个是非曲直不可，流露了老牛舐犊之情。遇到学生病了，亲自去请医，送饭送水，关怀备至。抗战时期他有个研究生傅懋勳生活困难，还带着个弟弟上学，他知道后，马上介绍他去

帮郑天挺教授抄稿子，以此来维持生活。后来收入还是解决不了他弟兄俩的困难，罗又介绍他到华中大学教书。傅当时有些踌躇，罗便勉励他说，教书也一样能做研究工作，何必一定要在联大呢？帮他解决舍不得离开学习岗位的思想，后来傅高高兴兴地去了。诸如此类的事不少，据1945年罗回忆说：“在过去五年内，为“吾道”四布起见，由我荐至各校任副教授或讲师者，专以中文系论，计华中三人，中大一人，交大一人，史语所三人，南开二人”^②。由此可见，罗常培不仅生活上关怀学生，更重要的是为理想中的事业培养人才，发展语言科学。因此他在联大很得人心，大家给他取了个外号叫“罗直文公”，借以表彰他为人正直，舍己耘人的优良品德。

1944年秋，他应美国朴茂纳学院之聘，以访问教授名义出国讲学。当时他宁愿领普通护照坐三等舱，也不肯为获得官员护照坐一等舱，而去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受训。这件事显示了他正直不阿的精神。他赴美的外汇，是卖书换来的，仅够旅费，但他途经印度时，曾分赠给他的学生吴晓铃、金克木、周达甫三人印币，各二百卢比，解囊相助，这使他的学生很感动，至今不忘。他到美国后，才知这所学院，正是当年授“博士”学位给梅兰芳的那所学校，对中国戏剧是有着特殊的兴趣，因此罗在这里讲了中国的戏剧。有一次他在讲课中，为了要弄清楚《尼姑思凡》这出戏里的一些菩萨梵语名称，不远千里写信给吴晓铃，要他帮助解答。吴是他的学生，先生向学生求教，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。由此可见他虚怀若谷，不耻下问的治学精神，非同一般；同时也反映他对外国学生讲课，也是一丝不苟，认真负责的。在这个学校任教一年半，1946年夏又到加利福尼亚大学讲学，在此开始对本行业作进一步的探讨。之后又到耶鲁大学任访问教授。次年转到密西根大学语言研究所，在这里会见了美国许多著名语言学家，和他们进行了学术交流，因而加深了彼此的了解。在美国四年，他常看到许多美国学者

从早到晚，孜孜不倦地伏案读书，很受鼓舞；同时也看到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民族歧视，使他感到讨厌和失望。当他在耶鲁大学讲学时，这学校准备聘他为终身教授，给他优厚的待遇，并叫他回国接家眷，但他思念祖国，归心似箭，对美国人民的友好情意谢绝了。在合同满期后，1948年夏，他便带着上述的情绪离开了美国。

罗常培回国后，看到的北平，比他离国前的昆明更加糟糕。这时他与各方面的民主运动已失去联系，个人无所适从，感到苦闷，每天除到北大上课外，余下的时间便是埋头书斋，整理过去的书籍和稿件。这年冬，人民解放军包围了北平，城外炮声轰鸣，但他还是潜心伏案，专心致志地写作。这时期他完成了《语言与文化》初稿，重订了“经典释文的徐邈音”等著作，又忙着为北大五十周年校庆赶写文章。就在12月17日北大校庆那天，南京国民党政府拍来电报，要用飞机接一批教授南下。当时国民党守军派人送给他两袋白面和飞机票，要他南飞，而城外的解放军也派人送给他毛边纸印的安民告示，两条道路摆在面前。在这关键时刻，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迎接光明的道路。

北平解放后，他跟全国人民一样高兴，作为一个满族人，他有翻身感。在国民党统治时，少数民族处于被歧视的地位。解放后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，一律平等，在某些方面还给予特殊照顾，新旧对比，使他深受感动。因此他心情舒畅，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及党的方针政策，积极投入思想改造运动。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，他进步很快，写了许多与思想改造有关的文章，如：《一年来对我思想改造的几个重要关键》、《一年抵过二十二年》、《我光荣地属于工人阶级了》等等，受到群众的欢迎。1949年他被邀请出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，后来又当上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，中国科学院成立时，又被举为语言研究所的所长。这段时期除了繁忙的政治活动外，他还

与王均合写了《普通语言学纲要》、与周祖谟合著《汉魏晋南北朝韵部演变研究》等书；并公开出版了《汉语音韵学导论》。这书原是在西北大学时的讲义，后来不断丰富内容，在二十五年的教学实践中，一共修改过八次，其中凝结着他多年来的心血。这本小册子虽只有七万多字、但言简意赅，把传统音韵学上的许多术语和含混不清的概念，加以爬梳剔抉，使读者一目了然。因此它是一部初学者的入门书，也是研究工作者的必读参考书，造诣不深的学者是写不出这样一部雅俗共赏的著作的。

此外，他还注意语言学的普及工作，和与语言学有关的边缘问题。他说过：“做学问固然要求精深，同时也不要忘记普及。”^③因此1950年他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了《相声的来源和今后努力的方向》一文，对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相声艺术的发展，表示了很大的关注。当时相声艺术这朵花有衰落之势，演员们生活困难，他发表了这篇文章，对相声的改革和发展，起了促进作用，演员们对此十分感动。再往前推，1935年他曾在北平以《京剧中的几个音韵问题》发表过演讲，对尖团字和上口字等问题提出过独到见解，并谓十三辙是民间口头文学的天籁，等等。他的看法是符合语言发展客观规律的。在旧社会民间文学称为俗文学，很少能登大雅之堂，有“身份”的专家学者，一般是不去问津的，特别是相声这行，人们称之为“贱行”，更是如此。而罗常培却与此相反，把它当做科学对象去研究，因此他在戏曲界受到尊重，这是不难理解的。

还值得特别一提的是他在培养语文干部方面也是费尽心血的。解放后革命形势发展很快，各地需要大量的民族语文干部，他及时地向领导建议，开办各种类型的专业学习班，培养新型的语文工作者。在他的建议下，1951年语言研究所利用晚上的时间，办了个少数民族语言调查训练班，1952年北大办了个三年制的语言专修科。后来，这些学员毕业后都成为掌握民

族政策和民族语文的干部，分散在各条战线上，为党为人民做出了应有的贡献。这些成绩的取得是与罗常培的建议和筹划分不开的。另外，他接受党要求他办好语言所的任务后，力疾从公，从各个方面充实研究所的力量，使这个研究所由小到大，由弱到强。后来又分出民族语言部分，另组成民族语言研究所。他积极贯彻党的民族语言政策，在培养少数民族语文干部，推动民族语文科研工作方面，起了很大作用。

罗常培不仅在“专”的方面严于律己，而且在“红”的方面也是积极向上的。解放后经过学习和思想改造运动，阶级觉悟有很大提高，他长期带病工作，热爱党，拥护社会主义，并立志以身许国。在他病重住院期间，曾口述由其家属代笔写了要求入党的自传，可惜的是还没有等到党组织对他进行审查和考验，他的高血压病突然发作，于1958年12月13日与世长辞了，终年59岁，这是我国学术界的一大损失。他留下遗嘱，告诉家属：把所藏的书藉全部捐献给国家，使它能被更多的人利用，发挥更大的作用。

罗常培一生著作很多，论文有百余篇，专著十余部，名驰中外，桃李满天下，在我国语言学的各个领域里，他的成就和功绩都是显著的，值得后人怀念。

注：

① 罗常培：《音韵学导论》序言。

② 罗常培：《罗常培致胡适》，《胡适来从书信选》下册，第34页。

③ 罗常培：《中国人与中国文》自序。

附云：在写作过程中，得其家属提供资料，稿成，又得傅懋勳、吴晓铃、周定一、周达夫等同志在百忙中审阅，并提供了宝贵意见。谨此致谢。